

报告文学：小人物故事同样能体现宏大意义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广东是报告文学的富矿

3月24日，长篇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研讨会在广州举行，该作品被广东省作协列为近年文学创作的头号工程，是国内首部全面讲述广东小康建设辉煌成就的大型纪实文学。

研讨会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该书通过“平凡人”的故事折射时代变迁，揭示了中国崛起与世界发展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辩证关系，为构建新时代岭南特色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

作家陈启文、王十月都参与了这部作品的写作，他们两人都有纯文学创作的背景，陈启文更是被报告文学界视为从虚构写作向非虚构写作转型的代表性作家。

非虚构写作现状如何？从纯文学创作到报告文学写作，有何挑战？羊城晚报记者为此专访陈启文、王十月——

羊城晚报：广东报告文学创作近年现状如何？

陈启文：一直以来，广东都是报告文学大省。就创作队伍而言，在全国知名的广东报告文学作家有十多人，骨干队伍至少三十人。可以说广东拥有一支战斗力强、有实力也有激情的报告文学作家队伍。广东也是报告文学的富矿，有丰富的创作题材。从革命历史题材、改革开放题材、城市化发展题材到粤港澳大湾区、脱贫攻坚奔小康题材，广东都有天然的题材优势。面对这样的富矿，我总是觉得时

间不够、精力有限，因为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仅仅是乡村振兴就有太多东西可写。

王十月：广东历来是报告文学大省，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一直都很强。一个地方提供的典型性越丰富，越容易出报告文学。广东就是改革开放的活样板，很多事情广东是第一，报告文学写第一个才有意义，这也是我们的题材优势。

羊城晚报：当下报告文学在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呢？

陈启文：目前，我们的报告文学确实还存在回避现实的现

象，尤其是缺少追问精神，文学性和思想性也有待进一步提升。文学应该从不确定性出发。有些人认为报告文学要写的是真实的事实，因而把真实性理解为确定性，由此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写一个飞行员的故事，就写这个飞行员很小的时候看到天上的飞机就想成为飞行员，这就是典型的从确定性出发，它排除了人生与命运的复杂性和其他可能性，只有定数没有变数，一看就是编造的、失真的。

我在写《袁隆平的世界》，一开始并未把袁隆平定义为“杂交

水稻之父”，而是带着不确定性和各种人生的可能性去呈现一个真实的袁隆平，即便他在农学院求学时，也不是一门心思从事农业、研究水稻，他先是想当一名专业游泳运动员，后来又想做飞行员，直到这两个梦想破灭，他才没有选择天空，而选择了大地，最后才一步一步走向杂交水稻研究这条路。

王十月：未来报告文学努力的方向一定是非虚构和重大选题相结合，让前者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写作的资源，让后者更有文学性、艺术性的色彩。



陈启文



王十月

报告文学在当下是一个强势文体

对人物形象的表现二者也有区别，虚构文学可以对人物或人物形象“塑造”，而报告文学则是对真实人物的“刻画”。后者需要从大量素材中选择能突出人物形象、性格的诸多元素，通过刻画呈现人物的特征和风格。

另外，还要区分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这两个概念，这是被很多人混淆了。非虚构是一个文类，报告文学是一个文体，非虚构文学包括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很多人把“非虚构”作为独立的文体，其实是一种误解。

王十月：我是把报告文学定位成非虚构作品在写，当成严肃文学来创作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充满辨识度色彩，作

家都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后来的确有部分报告文学慢慢变成了偏于表扬、歌颂。

但是我们在写《奋斗与辉煌》时，基本秉持客观、公允、准确的态度去呈现广东小康建设之路。因为中国的小康建设到今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没有那么容易，如果我们忽视了问题，就忽视了奋斗的艰难，所以必须正视它。

跟虚构的文学作品相比，报告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历史事实要准确，不能脱离事实，比如中间写粮票废除是哪一天，还有各种经济数据，都不能错，要经得起考验。更难的选材，报告文学要面对海量的历史材料，怎么选怎么组合非常考验作者的功力。

羊城晚报：当下报告文学的创作现状如何，创作群体、作品规模大吗？

陈启文：报告文学在当下是一个强势文体，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作家队伍和作品规模都相当大。因为这个文体离社会现实最近，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这几年的抗击疫情，都需要报告文学作家拿起手中的笔去及时反映。

很多时候，报告文学的作家跟新闻工作者一样，会第一时间奔赴重大社会事件现场，面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时代节点，以文学的方式向读者报告事实真相。

王十月：报告文学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在写，光小康这个题材就出了不少报告文学作品。

用资料复制粘贴是对报告文学的伤害

羊城晚报：有人说报告文学最难的就是兼真实观照与审美品格，你在创作中有遇到这个问题吗，是如何解决的？

陈启文：报告文学在坚守真实的前提下，还是有文学的表现空间的。有人说报告文学不可能有文学性，这种判断是一种偏见，也缺乏对报告文学全面深入的了解。很多优秀的长篇报告文学，无论在构思、语言、形象刻画、人性挖掘上，绝不亚于长篇小说。

报告文学不是没有文学性，而是你有没有能力写出文学性。报告文学同样是文学创作，但有些作者在写报告文学的时候根本不是在文学创作，更像是“百度文本”，就在网上搜一搜，资料复制粘贴一下，既没有现场，也没有人物形象，这种作品贴着“报告文学”的标签，但根本就不是什么报告文学。像我们写的《奋斗与辉煌》，没有回避问题，而是直面历史现实。为什么要改革？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多多少少遇到了阻碍，存在着诸多问题，所以要改。如果回避问题，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因此，本书第一卷就从大逃港写起，从改革开放前社会面临的问题写起。

王十月：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问题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代我们有“风雅颂”，今天我们有了主旋律的写作。美国很多大片也是主旋律的，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国家叙事”是需要的，只是说我们把这个“国家叙事”做到什么水准，把它做得好一些，还是应付一点。像《奋斗与辉煌》，仅序言我们就就易其稿，改稿会也反反复复地开，大家都很重视，全身心投入这个事情，才能做好。《奋斗与辉煌》既有宏大叙事，也带着问题意识关注到小人物群体，两者都兼顾到了。

羊城晚报：报告文学是不是题材决定价值？是否选择了重大的题材就一定有宏大的影响和意义？

陈启文：这个观点肯定是不对的。报告文学的价值不是由题材决定的，题材固然重要，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从来不是题材，而是由作者的写作水平和价值取向决定的。有些作者热衷于追踪热门题材或重大题材，但选择重大题材未必就能写出宏大的意义，这

取决于你的境界，有境界自有高格，即便是小人物的故事、小切口的叙事，同样能体现时代的宏大意义。

王十月：规划的题材其实也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奋斗与辉煌》就是群策群力的结果，众人智慧的结晶。面对这种宏大的题材，集体比你一个人想问题更全面、更周到、更全面。小说可能难以这样操作，但是我认为报告文学可以这样操作，《奋斗与辉煌》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尝试。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当下报告文学倾向于“歌颂”“宣传”，您是如何看的？

陈启文：相比上个世纪80年代，目前报告文学确实以颂体为主，但是真正的报告文学对社会现实应该有更全面、更深刻的反映和揭示，尽管揭示现实问题的报告文学不多，但是依旧有很多作家在秉笔直书。像我们写的《奋斗与辉煌》，没有回避问题，而是直面历史现实。为什么要改革？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多多少少遇到了阻碍，存在着诸多问题，所以要改。如果回避问题，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因此，本书第一卷就从大逃港写起，从改革开放前社会面临的问题写起。

王十月：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问题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代我们有“风雅颂”，今天我们有了主旋律的写作。美国很多大片也是主旋律的，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国家叙事”是需要的，只是说我们把这个“国家叙事”做到什么水准，把它做得好一些，还是应付一点。像《奋斗与辉煌》，仅序言我们就就易其稿，改稿会也反反复复地开，大家都很重视，全身心投入这个事情，才能做好。《奋斗与辉煌》既有宏大叙事，也带着问题意识关注到小人物群体，两者都兼顾到了。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

今年两会，“以何种方式鼓励生三孩”是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从“高考加分”到“弹性学制”，代表委员们穷尽了“资源想象力”去为多生助攻。这种“我为多生献一计”的热烈氛围下，冷静地把眼睛往回看，朝过去的方向深情地看一眼，关心那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这种关怀视角体现了一种良心。

全国人大代表陈雪萍建议，提供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养老补助，鼓励兴办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院，在政策所规定的退休金的基础上，独生子女父母退休金上浮10%-20%，并允许已达到退休年龄的独生子女父母投靠异地工作生活的独生子女。陈雪萍说，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已迈入老年行列。

他们的子女正值干事创业黄金期，也赶上全面开放二孩、三孩政策。独生子女一方面要拿出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同时要腾出精力培养教育孩子，探视照顾父母的时间已所剩无几，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医疗等方面问题已逐渐凸显。

这个建议迅速被公众顶上热搜，网民不仅顶了这个建议，还提出了更彻底和公平的方案：养老金上浮，要普及到那一代所有独生子女父母，千万不能遗忘农村。

一个政策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作出调整，政策因时而变，但政策所包含的承诺不能变，要保持稳定预期的连续性。当年“只生一个好”所包含的家庭外养老承诺，应该得到履行。这是保证政策连续性和制度公信力，应有的政策担当。

李雪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如是我闻】

“禁书”事件

晚年的时候，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他的回忆录《为中国着迷》中回忆，1943年在北平中德学会任职时，接待南京德国大使馆公使视察，因为一本“禁书”放在公使眼皮底下，发生惊人的一幕：

1943年，南京德国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埃里希·科德特公馆——德国1941年7月已承认日本人任命当地政府——来北京进行官方访问的时候，也到了中德学会。在经过图书馆中文部分的走廊时，他随手挑出一本书——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的中文版，这本书在德国被禁，本来是不允许摆放在那儿的，但公使没有说什么。所以，我有点心，不过接下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事。那时，我们哪里知道，科德特与反纳粹的反抗运动保持着联系。我们50年代再见面时，他回忆起这个插曲并对我谈到了上述情况。

这在当时是可以无限上纲上线的重大事件，好在科德特当时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最大的孝

阿嫂身怀六甲后，朋友常提的一个问题是：“孩子生下后，是交给你母亲照顾吗？”对此，阿嫂淡定地说：“不，我自己带。”朋友讶异地问道：“你有工作呀，怎么带孩子呢？”阿嫂微笑着答道：“当年的母亲，就是我仿效的一面镜子——她带大了三个孩子，可她并没有放弃工作呀！”顿了顿，又说：“母亲辛劳了一辈子，好不容易卸下了担子，我又怎么能逼她走回头路，让她重为尿布和奶瓶折腾？我要让她享受含饴弄孙的乐趣，我不要她熬受照顾孙辈的苦头。最重要的，我还要还她自由，让她在晚年过上随心所欲的好日子。”

好个“还她自由”！这是成年的阿嫂给母亲一份最好的献礼。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老年代，目不识丁的妇女把照顾儿孙当成天职，一代长大了，又照顾下一代，乐此不疲。她们就像是农妇，庄稼是她们人生唯一的期盼，收割了一季的稻香，便期待另一季……

然而，现代许多职业妇女，在时间的夹缝里想方设法把孩子妥妥贴贴地养大，虽然辛苦，但却圆满地尽了一己责任。她们一心盼望着退休后的安逸与悠闲，她们全心渴望能在夕阳稍纵即逝的余晖里享受那璀璨无比的金光；可是，接踵而来的孙儿孙女，却使满地温柔的金光碎不成形，看起来就像是闪闪烁烁的泪光。母亲，佝偻着腰，鞠躬尽瘁，直到老死……

还她自由，是最大的孝。

【横眉热对】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虎猫命运之异同

其实，虎猫是不可能对峙的。猛虎生活在山野，被人围剿，剩下的只好活在动物园里，供人参观，猛之不存，徒余吼叫而已。更可怖者还要被训练，去做马戏团的主角，在戏台上供人取乐。不用猜测，所谓培训，其中一定包括可怕的电击法，出错了严厉惩罚，然后，惩罚后给足肥肉。这一打一捧，足以驯化野性。

猫小巧，多数生活在都市中，穿街走巷，暗夜里偷欢作乐，正不知有几许自在。环境的缘故，猫注定永远无法遇见猛虎，更遑论对峙争斗了。还有，猫已为人类成功改种，无复野性，与人相伴，像枕头般被万般抚摸。这自然是



人生阶梯

□图文 唐亮

这是不久前我在广州淘金路附近拍摄到的一景：放学后，三代人同行，大人牵着小孩的手走上台阶。调皮的孩子们非要走中间的滑道。

可以想象，几年之后，孩子长大了，他们会松开手自己走。再过一段时间，他们会牵上另外的手。

人生就像阶梯，一级一级往上走。在这并不太平的人世间，愿我们一步一个台阶向上，不孤单。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做父母做子女都需要学习

第一次读政法记者出身的作家须一瓜的小说，是她刊载于《收获》的中篇《淡绿色的月亮》，一起入室抢劫案，突发事件之外，更重要的是被“摧毁”与“拷问”的信任与情感。此后读到她的小说，一直有着敏锐的社会性与话题性，叙事曲折跌宕，重心却落在锋利地剖开世相人心的隐秘世界上。如她的长篇《太阳黑子》被改编为电影《烈日灼心》就曾引起热议。

须一瓜最新长篇《宣木瓜别墅》，叙述主线围绕着如今日益引起关注的心理咨询领域，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与他的原生家庭密不可分，女孩王红朵的父亲王卫国是一个精明成功的商人，但强势而暴力，母亲美静没有保护孩子免除暴力惩罚，很多时候她的絮叨与附和

反而加重了父亲对孩子的处罚，给王红朵和哥哥王红星留下刻骨铭心的伤痛，哥哥离家出走，王红朵变得非常自闭，这时，心理咨询师光辉老师偶然结识了他们，开始了心理疗愈的过程。在王红朵的眼中，他的宽厚与心理开导，实际上是代替了她渴望“父亲”的温柔，也许是因为叛逆和代偿心理，她爱上了光辉老师并结了婚，一家人搬入了宣木瓜别墅，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一场更沉重的噩梦也拉开了序幕……

小说写到了多个人的死亡，然而给人印象深刻的，却是父母和子女在心理与情感上的严重错位，原来，做父母做子女都需要学习，换一个立场，换一种表达，也许就不会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痛。只是，成长后的王红朵痛切地感悟到父母的爱的时候，已经来不及。

【夜阑听风】彦火 香港作家

白玉兰树下的张洁

南国的三四月，是花团锦簇的花季，我特别怀念闽南家乡的白玉兰。

移居香港后，曾在花槽、平台种过白玉兰，都没有成功。也许这个蕞尔小岛不适合高洁的白玉兰。

在白玉兰盛开的季节，想起张洁笔下“优雅得甚至让人感到了一点忧伤”的白玉兰。

上世纪80年代初，张洁曾惠赠一帧在白玉兰树下拍的黑白照片，庄容清丽的她，仿佛也有那么一点难以察觉的忧伤。

然而，喜欢白玉兰的张洁悄悄地走了。今年1月21日张洁在美国纽约的公寓逝世，相隔两周后，2月7日才由中国作家网发布。

闻噩耗不禁黯然。

我与张洁于1981年开始交往。最初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十周年活动的聚会认识的，地点在政协礼堂。当年我与萧滋兄代表香港三联书店专程前往祝贺人文社。在那里，见到不少开放后大陆著名新老作家。张洁是其中一位，她刚出版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当时引起争议。她与写《人到中年》的谌容、写《北极光》的张抗抗，都是大陆文坛新时期杰出的女作家，备受瞩目。我还特地给她们三位拍了一张合照。

张洁的一身装扮特别雅致，加上娴熟的仪容，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此后与张洁有较多来往。